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文库

元杂剧 艺术生成论

YUANZAJU YISHU SHENGCHENGLUN

张本一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书 农
 贾建国
责任校对 毕瑞云
封面设计 袁 伟
版式设计 胡颖君

Y U A N Z A J U

Y I S H U

S H E N G C H E N G L U N

ISBN 978-7-215-06930-5



9 787215 069305 >

定价:16.00 元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文库



元杂剧艺术生成论

张本一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杂剧艺术生成论/张本一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215 - 06930 - 5

I. 元… II. 张… III. 杂剧—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179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8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都市经济的繁荣与百戏杂伎的汇聚	1
一、北宋时期中国北方都市经济的繁荣	1
二、金元时期中国北方经济与都市商业文化的曲折发展	6
三、百戏伎艺向都市的汇聚与叙事文艺主导地位的确立	14
四、从单一注重伦理教化到多元文化背景的戏剧形态之变	26
第二章 叙事体说唱艺术向戏剧的渗透	42
一、讲唱艺术与元杂剧有相同的故事源流	43
二、故事情节结构与演述上的相似性	50
三、元杂剧之演述体制中的叙事文艺特征	61
第三章 从歌舞大曲向元杂剧四折音乐体制的演变	77
一、大曲与金元杂剧曲乐结构的相似性	79
二、大曲与金元杂剧宫调组合的一致性	84
三、大曲与金元杂剧演述方式的相似性	90
第四章 弦索与金元北曲的关系	100
一、弦索是金元北曲的主要演奏乐器	100
二、弦索与北曲语体的谐和	108
三、弦索是北曲曲乐成熟的重要标志	111

第五章 北曲曲牌联套的形成与杂剧宫调的定型	115
一、联章体俗乐在都市的兴起	116
二、诸宫调对诸种俗曲的吸纳融合	121
三、货郎儿的生成、艺术形态及其在杂剧中的运用	125
四、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对北曲音乐的影响	132
第六章 俗乐艺人的职业化与杂剧艺人的艺术修养	141
一、俗乐艺人的艺术实践	141
二、元杂剧艺人及其对杂剧传播的作用	154
三、元杂剧演员的艺术修养	158
第七章 中州之正音与天下之通语	169
一、元曲用韵为汴洛语音系统辨析	169
二、元杂剧的用语及其艺术风貌	177
第八章 元杂剧中的诸杂伎艺和元代流行的俗乐	192
一、元杂剧中的诸杂伎艺	193
二、元代杂剧之外的俗乐伎艺	210
三、元杂剧的演述形态	221
参考书目	229
后 记	232

第一章

都市经济的繁荣与百戏杂伎的汇聚

一、北宋时期中国北方都市经济的繁荣

元杂剧是在综合宋金杂剧、院本及说唱伎艺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宋、金、元时期的诸类俗乐歌舞曲调而形成的新的艺术形式,是“合歌舞以演故事”为特征的中国古代戏剧成熟的标志。因此,探讨其形成的各种机制,必须以北宋以降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由此而决定的俗文艺发展方向为逻辑起点,而都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是“真戏剧”得以生成并取得长足发展的直接动力。

从晚唐到北宋,属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转型阶段,虽然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没有根本动摇,但居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业经济却获得了飞跃式发展。经历五代十国的战乱和分裂,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原。虽然其国力和威势远不如大唐之盛,但就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总体而言,却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是在经济内部,发展壮大了都市商业经济与文化。两宋统治 300 年,农业的产量一直保持在唐代的最高水平,劳动生产率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官私手工业均有了较大发展,无论是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还是手工产品种类、质量等,都远远超越隋唐以前的任何朝代。北宋定都汴梁(今开封),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政治中心的确立,使得商业经济飞速发展,都市人口激增,最终破坏了由唐代延续而来的城市格局,城坊制在宋代逐步消亡。

“坊市合一”成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以来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行政管理单位和城市居民生活区,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店铺不能向大街开放。唐代都市“日中击钲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关市”^①,是为惯例,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贸经济的自由发展。北宋定都汴梁,坊市制度渐被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所取代。这是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心向东南转移,而汴梁(今开封)的地位因此愈益重要,如时人所谓:“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②北宋定都于汴,不复回至关洛,原因就是汴京较为接近东南财富之区,当汴淮运道之要冲,在经济交通上较关洛更为便利。北宋时期,也是以汴渠为交通中枢时期。据《宋史·食货志(上)·漕运》载:

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即蔡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

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粟,于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泝流入汴以达京师;……

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入汴以达京师;……

粟帛自广济河而至京师者,京东之十七州。

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师者,陈、颖、许、蔡、光寿六州。

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

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犂负担至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

① 《唐会要》卷八六。

② 刘大宽:《汴州纠曹厅壁记》,见《全唐文》卷七四〇。

由此可见汴河所控领域之广远,除江淮、两浙、荆湖等路外,岭南、川蜀之货入京师,也大都经由汴河。据《宋史·河渠志》载:“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湘,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三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京城内因此一派繁华,“华夷辐辏……工商外至,络绎无穷”^①。张大新《宋金都城的繁盛与古典戏曲的成熟》一文,勾勒了汴梁从战国到北宋的发展线索,指出:“自唐后期为始,汴京即为水陆转运之中心,沟通大运河的汴河经过后周王朝的疏浚治理,更成为赵宋王朝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古城东京俨然跃升为商业文化气息浓厚的国际性贸易大都会。”^②从北宋极盛时汴京人口数量便可窥见其发展盛况之一斑:“(东京)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地,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③据吴涛考定,元丰年间(1078-1085年),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23.5万余户,人口最多时达140多万^④。而周宝珠在《宋代东京研究》中对东京户籍人等作了细致推算,自宋初到北宋中期,汴京人口逐年递增,其盛时最保守的数字也在150万人上下,其中包括驻军20万,皇室官府成员及为之服务的各类工匠约10万人。此外,未列人民籍的僧尼道士近3万人。王公贵族蓄养的歌儿舞女不计,单是遍布全城的官私妓女也在万人以上^⑤。

北宋中期以后,由于人口激增而导致城市成倍扩大,渐渐出现了商业活动的“侵街”现象:随处可见店铺、酒楼与民居,官府、寺宇相错,杂

① 脱脱等:《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

② 《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③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④ 吴涛:《北宋都城东京》第二部分《东京的城市人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⑤ 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第29页。

然于街面,就连宣德楼南面御街两列的街廊也“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而且通宵营业的夜市成了汴梁的特色。朱雀门外街巷妓馆云集,“街心市井,至夜尤胜”。州桥夜市以各类小吃闻名。马行街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①到宋神宗时,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②。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以稳定社会秩序,曾作过维护旧有城市格局和制度的努力,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加宽街衢,使“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③,但这一努力收效甚微,店铺侵占通衢大街的情况屡禁不止。到了宋徽宗时期,干脆就以征收“侵街房廊钱”的形式承认了这种行为的合法性。在商业行为和政府行为的较量中,商业行为第一次争取到了合法的地位,这也是中国社会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因此,北宋中后期的东京便出现了这样的繁华盛况:“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房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使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④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北宋朝廷于天禧三年(1029)实行了坊郭户籍制度,对坊郭户列籍定等。也就是说原本居住于城郭的大量人口由此而获得了城市户籍。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并开始以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源于中国自然经济形态中剥削方式的改变。唐代后期,均田制无形消亡之后,历五代以至北宋,土地私有,可以

①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9页。

②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二月戊辰纪事。

④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买卖,且成为定制。农民对土地依附相对前朝大为松弛,生产生活资料得到了满足,对土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趋于自由。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认为,宋代实行的两税法与科举制度是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两大杠杆^①。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两税法”使“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②。而科举制则使士人从有利于世族门阀的“九品中正”选人制度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这种解放,使北宋顺利地完成了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建构,用人权归属中央,人才纵向流动,“取士不问家世”,使大批以世俗地主为主体的大量人才拥入官僚机构,成为品官地主,而非由世族力量决定的门阀地主。这对中唐以前的社会采用不自由劳动形态的庄园制(部曲相当于农奴)来说,劳动者对于土地的依附大为减弱,因此大为自由和解放。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中唐以前的社会以采用不自由劳动形态的庄园制为特征,这一中世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变的契机是个人所有权的发达,因此,在私有庄园被细分开的同时,均田制中受田制的耕作权转化为所有权,同时衰败的自由民大多同有实力者结成租佃关系,取代部曲劳动阶层,即形成佃户,两税法不外乎是这种土地私有和借贷关系扩大的背景下公开承认人民的土地私有而已。这样形成的宋代地主制,采取分散的土地形态,劳动者成为被解放的自由民^③。应该说宋代开始的中央权力的加强,中下层世俗地主的大量拥入政权,人民对于地主、土地依附关系的弱化而获得较大的自由,为城市商业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因为外部的经济因素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权制度的调整,汴京成为一个由金钱和货物驱动着的各色人等构成的消费性大都会,它钩连着

①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八篇、第九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111页。

② 见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

③ 转引自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第23页。

四方的城镇与乡村,连接着异域与中原;它带给人们的是一次人性的较大解放,给人们对生活的选择乃至对传统身份的超越以相对自由的空间。金元时期,虽京都旧日繁华不在,但商业文化传统依然曲折发展着,并且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人口的集中与流动状况也变得更为复杂。

二、金元时期中国北方经济与都市商业文化的曲折发展

金元时期的中国北方,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因战争而受到阻滞或影响,但并未因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衰落。有学者认为那个时期的北方经济仍然是发展着的,并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南方^①。此说是有历史根据的,因为女真族和蒙古族的相继南来,并非完全的烧杀掳掠,而是逐渐意识到了统治汉地的文化力量。因此,虽政权更易,生产生活方式却仍依“汉法”,农业及工商业的发展也恢复较快,加上北方汉族大地主集团的着力保护,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短期的和有限度的。如女真人南侵之初,据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出使金国的许亢宗亲眼所见:“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涿州则是“人物富盛,井邑繁庶”^②。南宋使者楼钥进入河北境内后,感叹道:“自此州县有城壁,市井繁盛,大胜河南,可知其民物之盛否。”^③金迁中都城后,依赖河北为主要的物资供应基地,河北地方财政和民间收入呈富庶之状。如金宣宗时“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④。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至迟在12世纪中叶,我国北方农村经济就趋于稳定,继而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⑤。实际上,12世纪中叶,我国北方农村不稳定的局面历时并不太长。从金

① 程民生:《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②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四〇,崔文印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楼钥:《攻丑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金史》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王禹浪:《金代戏剧的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太祖阿骨打起兵反辽算起,到熙宗皇统元年(1141)与宋议和为止,不过30年的时间。后来,虽然经历了海陵王(完颜亮)南伐战争及天下骚动之乱的破坏,但很快以海陵自焚而告终,对整个金代的农业经济摧抑不大。世宗继位以后,与南宋重新议和,南北两方都处在相对稳定的形势之下。经过世宗近30年的努力,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史学家称其为“大定之世”,世宗本人则被后人称为“小尧舜”。

继世宗后,章宗在位19年(1189-1208年),使金朝达到了全盛时期。从人口增长和粮食产量增加情况可以显见那时中国北方经济发展之状。据《金史·食货志》载,大定初年,金朝占领区的总人口只有300余万户,到了大定二十七年,人口户数增长了一倍多,达6789449户,而到了章宗泰和年间,总人口户数则增长到了800余万户。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辽和北宋时期的人口户数。由于农业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产量逐年增长,“世宗时期使设常平仓,至章宗明昌三年天下常平仓共有五百一十余处,积粟三千七百八十万三千余石,可备四年之用”^①。由此可见,金朝对我国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并非一直起破坏作用的。入住内地的女真与契丹人渐被汉化,到元代已成为汉族中的一支,已完全融入汉地文明之中了。金章宗时出现了俗文艺的兴盛,且出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那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与相对平安繁荣的区域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不可否认,与金源南来类似,蒙古灭金之战同样给中原经济文化带来了较大的破坏,甚至出现了奴隶制剥削关系的历史暂时逆转。但由于北方世侯纷纷降蒙而据地自保,避免了与蒙古铁骑的正面冲突。如西京刘黑马(1212年降)、真定史天泽(1213年降)、顺天张柔(1218年降)、东平严实(1220年降)、济南张荣(1226年降)、益都李璫(1227年降)等均先后选择了归顺蒙古政权并与之合作的历史之路,一定程度

^①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上减少了战争创伤,使得汉地文明得以保存与延续。战争结束后,生产力恢复较快。由于元代空前的开放政策,到忽必烈时代,中原腹里之地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已达到了空前的兴盛。

其实,蒙古从窝阔台汗始,已改变了既往对中原的掠夺屠杀政策,逐步采取长久之计,以“汉法”治理汉地。据《元史·太宗纪》,太宗元年(1229),“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户调,耶律楚材立之”。二年,“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并设置了十路课税使,其长官均由汉人充任。五年(1233),汴梁宋将已降,金主奔归德,蒙古已占淮河以北地区,强化了对汉地的全面统治,“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并且于十二月敕修孔子庙及司天台,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于是年夏六月,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編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为进一步稳定汉地秩序,又于九年(1237)“秋八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可见蒙古统治者是依靠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汉法”来规划统治中原的。当然那时期也存在掠夺的残酷性,如西域商人的羊羔息就曾使无数贫民倾家荡产,对经济的恢复危害很大。为改变这一状况,太宗十二年(1240)政府下令,“以官民贷回鹘金价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錠。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牟而止,著为令。籍诸王大臣所俘男女为民。”因此,蒙古太宗统治时期,治理中原的成效是显著的,中国北方的生产力恢复也是比较快的。故《元史·太宗本纪》如此评价太宗:“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马羊成群,旅不斋粮,时称治平。”虽后来乃马真称制和贵由汗执政时期,民力困乏,太宗之政衰,而十年后的蒙哥汗时期,倡导节俭,与民休息,涵养民力,经济生产之状又有所恢复与缓和。

雄才大略的忽必烈于蒙哥汗元年(1251)受命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据《元史·世祖本纪》,他首先是制定禁止扰民的具体规定。“遂

颁便益事宜于国中：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诸王不得擅招民户；诸官属不得以朝覲为名赋敛民财；民粮远输者，许于近仓输之。罢筑和林城役千五百人。”对军事活动扰民尤加严处。如六年(1256)秋七月，“诸王塔察儿、驸马帖里垓军过东平诸处，掠民羊豕。帝闻，遣使问罪。由是诸军无敢犯者”。八年(1258)五月，“皇子阿速带因猎独骑伤民稼，帝见嚷之，遂挾近侍数人。士卒有拔民葱者，即斩以徇。由是秋毫莫敢犯。”其次是延揽了大批藩府旧臣和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接受汉地文明。即位之初，便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举庶政，立十路宣抚司，李德辉、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史天泽、杨果、张德辉、刘肃、姚枢、张文谦、廉希宪等为主的儒臣或汉地世侯宣抚诸路。于中统元年(1260)六月，“召真定刘郁、邢州郝子名、彰德胡祗遒、燕京冯渭、王光益、杨恕、李颜通、赵和之、东平韩文献、张昉等，乘传赴阙”。世祖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儒士幕僚集团。世祖尊儒重道，制礼作乐。至元四年(1267)三月，敕中都城建司乐堂，使乐工隶业其中。耶律铸制宫悬乐成，诏赐名《大成》，并于四方遣使祭祀岳渎。1271年忽必烈以“元”为国号，取《易经》“乾元”之义，表明他对汉族文明的推崇。改中都城为大都，由刘秉忠等规划营建，并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世祖改元后，进一步加紧对南宋的战争，1276年，南宋降，1279年，宋王朝的最后一个流亡朝廷在岭南覆灭。元灭南宋的战争，对社会经济破坏不大。虽然元朝在统治政策上对“南人”有歧视和压迫，然而由于南方地主阶级的利益基本得到保护，大批儒士被征辟，南方地主阶级对元朝的态度也渐由敌对而转向拥护。尤其是在元中期以后，大批儒士出仕食禄，表明了对元朝的最后承认。

在农业逐步恢复，社会走向安定的基础上，由于国土一统，交通畅达，工商贸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客观条件。马上得天下的元统治者十分注重都城的营建、财富的聚敛，一改“重农抑商”传统观念，“以功利诱天下”，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元代的商业从某种意义上说，

其发展速度是超越前代的。从战后几处中原城市的治理可略见商业经济发展之状。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十八《武略将军彰德录事朱公墓志铭》记朱泉之政绩：

壬辰(1232)冬,(朱泉)超拜武略将军,彰德录事。当南北要冲,兵余,市井萧条,官府草创。躬身率下,披荆榛,拾瓦砾,扶疮痍,集市肆。不三四年,既庶且富,四境邻邑政治莫能及。

《紫山大全集》卷十八《大远怀远大将军怀孟路达噜噶齐兼诸路军鄂勒蒙古神道碑》记了丙申年(1236)即金亡后第三年鄂勒蒙古任彰德达鲁花赤的政绩,在记述战后萧条动乱的社会环境之后云：

公解案莅政,知民以是为苦。即下令曰:“敢虐民者当以法绳之。工贾居肆各成其市,门户开朗,安生乐业,无警疑恐惧。为农者各安畎亩,趋时力田,无苟且荒怠。苦汝者,吾能训导禁治之。”令下,强暴者柔顺而莫敢犯。野耕途行,坦坦熙熙,始知有生之乐。

王恽《秋涧集》卷四十七《故真定路万户府参议兼领卫州事王公行状》记王昌龄于1251年主政卫州时的政绩：

公下车以来,敬以奉上,恭以执事,巨细不遗,知所先后。哀民之困于蚕丝也,均徭平赋以蓄其力;痛政之极于污染也,治官汰吏,以消其源。并容细民,不扰市肆;懋迁有无以通舟车;建堤防以捍水灾,课农桑以抑游手,尊王人则修馆舍,免病涉则平桥梁。励薄俗,扶善良,礼贤俊,赡贫乏,衍郭郭,广厘居。通商惠工,兴滞补弊。民不见吏而无吠警之虞,士格所耻而咸行于色。

由此可见,蒙古统治者除注重安定天下,恢复注重农业生产秩序外,尤

其注重市肆工商业的发展,诸如城市建设、货物流通、交通线路开辟等。这实际上是对传统封建经济形式的一大变革。除因统治之需而重用大批儒臣外,忽必烈身边同时还聚集了一批注重实利的理财家,阿合马、桑哥甚至由色目商人人任为宰相,一度得到忽必烈的极大信任,以致屡有疏远儒臣之举。唯事货利,使得很多资源都得到开发利用。据《元史·食货志》,元朝的国家收入方式,除岁课、盐法、茶法、酒醋课、商税、市舶之常例外,还记有额外课,课名有 32 种之多,远远超过前代。这足以反映元朝百业之兴盛。中原汉人依附于土地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论逃户》对中原内地的传统生活方式作了这样的概括:“汉人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蚕绩而衣。凡所以养生者,不地著则不得也。故安先世之田宅,服先畴之畝亩,守前人之世业。十世百世,非兵革易代、掳掠驱逐,则族坟墓、恋乡井,不忍移徙。此汉人之恒性、汉人之生理古今不易者也。”汉人依附于土地的僵化的传统生活方式在金元易代以至元一统之后,不得不适应经济社会的环境而发生变化。蒙金争战时,“河南北兵荒,人不地著”^①。忽必烈时期中原依然存在大量的“逃户”和“复逃户”。这与农村的相对凋敝、社会的动荡不安有关,当然也与城市工商业相对发达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因此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镇,“他处得生理”或“流徙远方为商贾为工匠”^②的情况十分常见。《紫山大全集》卷十八《显武将军安阳县令兼辅岩县令李公墓志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中统二年(1261), (李玉)自以禄仕四十余年,功成名遂,不得勇退为恨,力以病辞。既得,请治生教子,三年致丰。鼓铁煮硃,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寒者得

①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十六《李隐者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论复逃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